



黄承梁,王慧,朱红艳,等. 论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的生产力范式[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6, 36(1): 18-28. [HUANG C L, WANG H, ZHU H Y, et 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productivity paradig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6, 36(1): 18-28.]

论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的生产力范式

黄承梁¹, 王 慧², 朱红艳³, 马青山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北京 100710; 2.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 上海 201306;

3.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创新为主导、突破传统增长路径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重构全球竞争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该研究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融合,深入阐释“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的理论逻辑、时代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以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为生成机制,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不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创新,更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建构走向系统实践的根本推动力。从生态文明是人类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新的文明形态看,新质生产力愈发彰显出推动生态文明生产力范式深刻变革的战略性能量,发挥着核心引擎的功效。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立足“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各项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地球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新质生产力理念、“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科学论断正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开辟道路、筑牢根基、谱写新篇。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生态文明社会”的“生产力”质态。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绿色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 F062. 2;F2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6)01-0018-11 **DOI**:10. 12062/cpre. 20251101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成为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2023年9月,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立足中国、面向未来的重大原创性概念。2024年1月,习近平在第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一直在思考,也注意到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

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内涵体系系统、全面、科学的重要论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刻把握了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脉搏和演进规律,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

整体性、时代性超越;精准把握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历史方位,赋予生产力理论以鲜明的时代内涵;明确指出“创新起主导作用”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将“绿色生产力”内化为生产力的新质态,深刻回答了“什么是先进生产力、如何发展先进生产力”这一根本性问题,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现代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就“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而言,把握这一科学论断、科学真理,整体看,要把握“新”和“绿”两大特质。就“新”的特质而言,主要体现在4个层面。其一,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其二,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核心的“新产业”;其三,以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三化”;其四,以创新驱动为内核的“新动能”。推动产业体系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转型。与之相对应,“绿”的特质主要表现为:其一,绿色技术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变量;其二,绿色能源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支撑;其三,绿色产业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其四,绿色消费形成推动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这些绿色要素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底色。

收稿日期:2025-10-29 修回日期:2025-11-10

作者简介:黄承梁,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基础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E-mail:heliang@163.com。

通信作者:马青山,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文明基础理论。E-mail:maqs@cass.org.cn。



2025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就“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战略部署和战略指引。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2]。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与时俱进特质,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独特价值,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基石。全面学习研究、学理阐释、系统揭示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科学真理的深刻内涵、实践伟力,学习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更加深刻理解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理论是深刻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化自然”与“自然化人”辩证统一的思想,推动“十五五”时期的各项工作向着统筹发展和安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共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对新质生产力理论特别是“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重大科学论断、重大命题、科学真理及其深邃的理论洞见、磅礴的实践伟力的深入研究。这一研究既承载着破解工业文明数百年“增长悖论”与“生态赤字”的历史性使命,更彰显出重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范式、引领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深层理论创新价值。

1 文献综述

自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提出以来,其迅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特别是“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论断,受到学界特别是生态文明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关注。当前研究主要围绕该论断的理论逻辑、内涵意蕴及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统一关系。如,丁任重等^[3]从本义上阐释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以绿色为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岳奎等^[4]认为绿色发展融入并赋予新质生产力以绿色底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向度;黄三生等^[5]认为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为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

关于这一论断的内涵体系,学者从不同视角深入挖掘。如立足于技术革命,周宏春^[6]认为,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能够为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动能;从方法论层面来看,侯美樾等^[7]认为发展绿色生产力科学把握了全面推进与因地制宜、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守正创新与

先立后破的辩证关系,是坚持以唯物辩证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集中体现。

关于多元化的实践路径探讨,周宏春^[6]从生产关系角度出发,建议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黄三生等^[5]建议加强制度建设,为绿色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李桂花等^[8]建议加快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推广,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

综合来看,当前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一是在理论渊源上。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论断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时融合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二是在核心内涵上。学者们一致强调新质生产力的绿色本质,认为绿色是其内在属性而非外部约束。这体现在其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旨归。三是在要素特征上。相关研究指出新质生产力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大要素上实现了绿色化、数字化、高端化的跃升。例如,劳动者须具备绿色创新素养,劳动资料趋向智能化和低碳化,劳动对象扩展到新能源、新材料和大数据等新型要素。四是在实践导向上。学界普遍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摒弃传统高消耗、高污染的增长模式,转向通过绿色科技创新、产业体系绿色转型(如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循环经济)以及体制机制创新(如完善生态补偿、绿色金融政策)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尽管学界已有诸多探讨,本研究则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论断进行理论拓新与战略擘画,其独特性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层面。一是在理论创新上,以文明形态变革为纲,系统构建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范式。当前研究多侧重于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内在关联,而本研究将这一命题置于人类文明形态更替的宏大历史叙事中进行审视,实现了研究视角的根本性跃升。核心创新点在于明确提出并论证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指导人类新文明形态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范式,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生态文明从理念走向现实的根本性战略抓手。二是从战略价值来看,这一论述将新质生产力的讨论从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到了文明存续与演进的战略高度。这为理解和推动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纵深和战略紧迫感。三是在内涵拓新上,厘清“生态社会”的科学内核,确立生产力在文明转型中的决定性作用。本研究对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正本清源的创新性阐释,避免了概念上的混淆与实践中的误区。创新点在于严格区分了作为“新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与一般意义上的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论述。四是从实践意义上看,要直面现实误区,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轨道。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借生态文明的口号,在实践中“不发展”“反工业化”“懒政怠政”,搞“形式主义”的现象时有发生。而新质生产力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金钥匙”。它通过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源头上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统一。这要求实践工作必须摒弃“一刀切”等简单粗暴、损害民生的做法,转向依靠科技创新和系统治理的精细化路径。

2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标志性理论成果。它深刻回答了在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生态文明转型交织的新历史条件下,什么是绿色生产力、如何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根本问题。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界定,构建了一个逻辑严密、层次清晰的概念体系。一是在基本内涵上,聚焦于“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9]516},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三要素框架基础上,强调要素间“质”的优化与系统协同的跃迁。二是在内涵本质上,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确立了其价值导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与历史先进性。三是在生成动力上,指出新质生产力源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揭示了其形成的动态过程与核心驱动力。四是在核心标志上,指出新质生产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超越了单纯规模扩张,实现资源配置效率与产出的质的飞跃。五是在特点与关键上,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灵魂,以质优为核心要求,共同服务于先进生产力的本质。这一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之问,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21世纪中国的系统化、具体化发展。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上述基本特征,相较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生产力观,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科学论断的“新”与“绿”,是在辩证扬弃基础上的历史性跃迁,体现在本体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的三重维度。

一是在本体论维度,实现了生产力要素内涵的革命性拓展。传统要素观经典理论主要聚焦于劳动者(体力与简单技能)、劳动资料(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物质手段)、劳动对象(天然或初级加工的物质资料)。在这三要

素中,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也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列宁对此指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10]。而劳动资料的发展水平则成为划分经济时代的标志,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1]210}。相对而言,新质要素观,其一,劳动者升级为以高技能、创新能力和数字素养为核心的新型人才,知识型、创新型劳动者成为主导力量。其二,劳动资料超越传统机器设备,涵盖智能算法、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孪生系统等,数字化、智能化生产资料、算力成为新型基础性劳动资料。其三,劳动对象极大扩展,包含海量数据、基因序列、量子态、深空深海资源等新型对象,以及经新材料、新技术深度改造的传统对象(如特种材料、合成生物等)。其四,新增关键要素。首先,科学技术(特别是颠覆性、前沿性技术)从一般社会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2]188}。同时,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3]。但在传统生产力中科技被视为外生变量。新质生产力则将科技创新视为内生变量,明确“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9]516}。其次,数据成为新型关键生产要素。传统生产力以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为核心,而新质生产力将数据纳入关键要素。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非竞争性、可共享性突破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稀缺性限制,这是对劳动对象范畴的时代拓展。最后,生态承载力内化于生产力系统。传统生产模式将生态视为外部约束,新质生产力则将其作为基础性约束与价值目标纳入系统内部。

二是在价值论维度,实现了发展目标的根本性重塑。传统目标主要强调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和满足基本社会需求,对生态代价与社会公平的关注相对从属(尽管马克思主义包含对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的终极关怀,但在传统生产力实践中常被简化)。“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科学论断的真理性之“新”主要体现在:其一,目标导向新,共产主义追求“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4]185},即实现“两个和解”。新质生产力将这一目标具体化为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内在统一。其二,“质”的跃升新,核心是以科技创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追求产品与服务的高品质、高性能、高附加值,推动生产力从“量”到“质”的根本性转变。其三,绿色发展内化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9]517},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理论,深刻揭示



了自然生态是生产力的内在要素,即解放生产力,一定是解放生态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定是发展绿色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指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9]¹⁵³。新质生产力将生态环境保护、资源高效利用、碳中和目标内化为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与价值内核,彻底超越增长与保护对立的传统二元困境。其四,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新发展理念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集中体现。

三是在方法论维度,实现了发展路径的系统性重构。其一,传统路径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投入驱动,技术进步多体现为渐进式改良。新质跃升路径体现为创新主导,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为根本动力,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依托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生产力从线性扩张向绿色低碳循环共生跃迁。其二,融合驱动,即绿色化、融合化、数字化等协同演进。绿色化是底色和约束,融合化是产业组织形态(如一二三产业融合、数实融合),数字化是核心引擎。其三,产业载体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支柱(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等),以未来产业(人工智能、量子、生命科学等)为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其四,制度适配,强调通过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如数据要素市场、绿色金融、科技体制、人才机制),以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观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生产力观的对比分析见表1。

同时,必须看到,新质生产力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是深刻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力具有历史继承性,“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5],新质生产力并非断裂式创新,而是对传统生产力的“扬弃”。其一,理论赓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其二,要素框架是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这一经典分析框架内进行内涵深化与拓展,而非另起炉灶。其中,特别强调科技的作

用,继承并强化了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6]的论断,将科技置于更核心位置。其三,继承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平台经济监管制度完善等实践,正是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现。这一现象与马克思揭示的规律完全一致。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4]⁶⁰²。新质生产力的兴起必然推动生产关系调整,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9]⁵¹⁷。这一论断与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完全契合,形成了历史逻辑与现实实践的统一。总之,“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科学论断的“新”与“绿”,绝非对传统生产力观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提下,通过对生产力要素内涵的革命性拓展、发展目标的根本性重塑、跃升路径的系统性重构,实现了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辩证扬弃与历史性超越。

3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

“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伴随整个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始终^[17]。马克思等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4]⁵¹⁶。这一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唯物主义根基,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本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摒弃和批判了“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理念,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其核心的“物质变换”理论蕴含自然与社会的统一。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

表1 新质生产力观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生产力观

维度	马克思主义传统生产力观	新质生产力观	“新”之体现
劳动者	体力劳动者,简单技能	知识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数字素养	强调智力资本、创新能力、终身学习
劳动资料	生产工具(机器设备)、基础设施	智能算法、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算力、智能装备	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成为核心特征
劳动对象	土地、矿产、原材料等天然或初级加工物质资料	数据、基因、量子信息、新材料、合成物质、深空深海资源	非物质化、高复杂度、可设计性、边界极大扩展
新增要素	科学技术(作为一般社会知识,起间接作用)	科学技术(直接生产力)、数据(核心要素)、生态承载力(内化目标)	科技成为核心驱动力;数据成为新要素;生态价值内化
组合方式	相对静态、线性组合	动态优化、跨界融合、网络协同	强调要素间“质”的跃升与系统协同



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1]207-208}。然而,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却将二者割裂,形成人类是主体,自然是客体的形而上学预设。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进行物质异化,将人化自然(即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然)异化为对自然的绝对支配,同时割裂了自然化人(即人类活动受自然规律制约)的辩证关系。这种异化导致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这样一种新陈代谢断裂,使得可持续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遭到了破坏。这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命题,更使传统发展模式陷入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困境。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本体论层面的认知谬误。

马克思的生态哲学始终以自然界的本体性地位为逻辑起点,与流俗的征服自然论截然不同。马克思明确指出,“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12]170},其核心在于强调人化自然的实践过程必须以自然规律的客观约束为前提。马克思批判道:“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8],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与生态规律的不可调和性。更进一步,马克思通过“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9]55}这一命题,赋予自然以本体论价值,即自然不仅是劳动对象,更是人类生存的有机延伸,“人靠自然界生活”^{[19]55},对自然的改造必须遵循其内在规律,而非将其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然而,资本主义却将这一“身体”简化为可无限攫取的资源库。这不仅背离了马克思的辩证自然观,更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反理性本质。

新质生产力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这一理论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动力,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融入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这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根基一致,即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承认自然的客观物质性,反对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实践是人与自然互动的核心中介。

进一步地,新质生产力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生产方式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体现了对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更通过实践层面的技术革新与制度创新,将自然系统的保护与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深度融合。它强调生产力发展必须以生态承载力为边界,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自然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这种发展模式既继承了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中介的核心思想,又通过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体。正如恩格斯所言:“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20],新质生产力理论正通过技术赋能与实践创新,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4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发展理念源于发展观。习近平创造性提出“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21]21}。绿色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指导中国发展问题的行动指南。坚持绿色发展,是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方位、革命性变革,突破了旧有发展思维、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是对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本质上是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双重逻辑下推动绿色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先生产力质态。习近平多次强调,“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21]86}。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9]515}。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科学论断的双重逻辑。一方面,它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生产全过程,推动生产力与自然系统的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它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支撑,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构建起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科学论断因此成为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理论支撑。

不同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忽视人的主体性和生态可持续性的传统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生态和谐,超越了传统发展观见物不见人的异化逻辑。中国特色的新质生产力理论作为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既深刻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又在新时代实践中拓展了其内涵与外延。其所蕴含的生态化与高效化双重属性,破解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冲突。在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指导下,高质量发展不再是“量”的扩张,而是“质”的升级;高水平保护亦非静态封存,而是动态修复。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这一理论创新的独特性恰在于此,其既未陷入西方生态主义“去增长”的乌托邦幻想,亦未延续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而是通过生产力质态



的跃升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在发展中解决生态问题,在保护中释放增长动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和二者的辩证统一,标志着人类首次在文明尺度上实现了发展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和解。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承认人民主体地位,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4]295}。科学技术的应用能为人类带来福祉,恩格斯指出“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作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14]77}。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释放劳动时间、优化劳动条件,直接推动劳动者从生产过程附属转变为监督者和调节者,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石。这一逻辑呼应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断:“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2]。

此外,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环境能够润泽人的精神世界,浸润人的心性和情感,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性支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3]。习近平强调,“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24]。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关键指标。为此,习近平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1]3},就是要以对人民群众和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让老百姓更满意,生活更美好。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顺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将生产力质变、跃迁的绿色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赢’”^[25]。

5 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需要新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作为支撑

习近平深刻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21]8}。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规律,更从文明形态更替的宏大视野,为我们理解生态文明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将生态文明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

文明并列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历史性跃迁,其最深厚的根基与最显著的标志,均在于生产力质的飞跃及其核心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革。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审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在本质上分别是“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文明形态,它们的确立无不以标志性生产力要素的出现为历史转折点。正如火与石器奠定了人类告别野蛮、走向文明的最初基石,铁器与犁铧开启了农耕社会的稳定繁荣,蒸汽机与纺纱机则驱动了工业文明的洪流奔涌。这些关键性的生产力要素,不仅是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的时代测量器,更是催生与之相适应的全新社会关系、制度结构与文化形态,从而塑造崭新文明范式的根本力量。历史已经证明,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成熟与确立,必然要求并建立在一种与之匹配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的生产力模式之上。

基于此,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真谛绝非泛化的生态保护或对环境问题的技术性修补,而是指向“生态社会”这一全新社会形态的文明表征,是应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要求必然选择。将生态文明置于生态社会的文明这一完整范畴下进行理解,是科学把握其历史地位的关键。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绝非在工业文明框架内进行边际调整,而是需要一场涵盖物质基础、制度架构与价值观念的全方位社会革命。而这场革命的根本动力,正来自生产力体系的系统性、质态性跃迁——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其绿色化的内在属性、创新性的核心驱动与数字化的智能特征,历史性地承担起为生态社会奠基、为生态文明塑形的时代使命,成为推动文明形态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根本力量。

首先,新质生产力构成了生态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石,回答了生态社会何以可能的根本问题。生态文明作为继工业文明之后的新型文明形态,要求从根本上超越工业社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代谢模式,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和谐循环。这一历史性跨越,依赖传统技术的渐进改良是无法实现的,必须依靠革命性的绿色技术集群突破。新质生产力所依托的颠覆性技术——无论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带来的精准化、智能化生产,还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驱动的清洁化、循环化利用——正是构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环体系的核心手段。它们在更高水平上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的同时,让大幅降低资源消耗与环境负荷成为可能,从而为生态社会提供了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具备的



物质技术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质生产力中的绿色科技,就如同“火与石器”之于原始文明、“铁与犁”之于农业文明、“蒸汽机与纺纱机”之于工业文明一样,成为开启并定义生态文明的关键性生产工具。

其次,新质生产力内在要求并催生着与生态社会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推动文明形态的整体转型。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破除阻碍其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探索,以及旨在激励绿色创新的产权与分配制度变革,这些正是生产关系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进而为生态社会构建制度框架的生动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26]。更进一步,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崛起与传统产业的绿色化、数字化改造相融合——正在重塑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就业结构,引导社会资本与劳动力向绿色低碳领域集聚。这种经济基础的变革,连同与之相适应的绿色生活方式、生态文化价值观的普及,共同构成了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全面社会转型。

最后,新质生产力确保了生态文明进程的历史必然性与实践可行性,科学回应了文明转型的时代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作为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非对工业文明的简单否定与抛弃,而是在其积累的物质与科技基础之上,对其中不可持续因素的辩证扬弃。新质生产力正是这一扬弃过程的集中体现,即它继承了工业文明时代积累的科技知识、管理经验与物质财富,同时又通过绿色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注入全新的、可持续的基因。这种继承与发展关系表明,生态文明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是生产力发展到更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同时,新质生产力将“绿色”内化为自身的本质属性,使得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内在统一,在实践中有效破解了发展与保护的对立难题,防止了将生态文明建设等同于停滞不前的“生态原教旨主义”或脱离物质基础的道德空谈,确保了文明转型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轨道稳步推进。

因此,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其孕育、诞生与成熟,必然以新质生产力为其根本性的战略支撑与核心驱动力。新质生产力通过提供关键的物质技术基础、催生新型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并确保转型过程的客观必然与实践可行,历史性地承担起推动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范式向生态文明范式实现伟大变革的使命。发

展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更是一场关乎人类文明前途命运的宏大社会实践,是开启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历史钥匙。这一认识,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的理解,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高度,为走出一条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历史新台阶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的磅礴伟力,正在被中华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实践生动诠释和有力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根本遵循,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实质性地融入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战略与微观实践之中。从对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壮士断腕式淘汰到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战略性培育;从能源革命的深入推进到全球最大碳市场的高效运行——这一系列开创性、深层次的实践,是从根本上革新发展范式的伟大革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立足“十五五”时期乃至21世纪中叶的宏伟征程,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更加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要求,全面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历史新台阶。

6.1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推动价值重塑,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文明体系

新质生产力的深远意义在于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7]这一崇高理想,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和实践路径,从而推动人类文明价值的深刻重塑。

一是要推动从“增长崇拜”到“福祉最大化”的价值观转变。新质生产力驱动的“质优”增长,打破了GDP增速的单一崇拜,将发展的评价标准转向包括经济繁荣、生态健康、社会公平、人民幸福在内的综合性福祉。它使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念转化为可度量、可感知的发展成果,重塑了社会的财富观与幸福观。

二是要推动从“人类中心”到“生命共同体”的伦理观拓展。新质生产力所内含的绿色属性,要求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在哲学层面推动了一种基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新生态伦理的形成。它既不是将自然视为可无限索取对象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要求人类放弃发展、退回原始的如前文所述的“生态原教旨主义”,而是强调在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基于科技创新



的和谐。

三是推动从要素重构到产业生态化的技术与经济范式的转变。新质生产力对经济系统的改造,本质上是催生一场深刻的绿色新技术、新产业革命,其核心在于使绿色、智能成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底层架构和内在逻辑。换言之,过去那种依赖资源消耗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两项技术突破,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技术和经济结合的模式,让整个经济体系转向绿色、智能的新跑道。要超越对传统要素的绿色化改造,以新质生产力催生出具有原生绿色基因的新型要素体系。在这里,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其非竞争性、可共享性和近乎零边际成本复制的特性,从根本上挑战了基于稀缺性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为资源效率的指数级提升提供了可能。绿色技术本身要成为一种核心资本,从而使其创新、扩散与应用不再是外生变量,而是经济体系的内生动力。

四是推动产业体系的循环化与网络化重构。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体系从“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模式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跃迁,并进一步升级为网络化、智能化的共生体系。生物技术、材料科学的发展,使得产品的易拆解、易回收、可降解成为设计起点,从源头杜绝废弃物。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产业组织形态的深刻变革,要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催生出基于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深度融合的产业共生网络,进而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

6.2 构建适应新型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并催生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历史新台阶,亟须构建一套能够有效激励绿色创新、约束不可持续行为、保障生态正义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一是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制度创新。核心是构建使“绿色”成为理性经济选择的制度环境。这包括但不限于,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确权、核算、交易等手段,让守护绿水青山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回报;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探索将其与用能权、排污权等市场协同,形成覆盖主要环境要素的价格发现机制;改革财政税收与金融体系,大规模推行绿色采购、生态补偿,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引导社会资本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集聚。同时,强化污染者付费、保护者受益、破坏者受罚的刚性约束,通过最严格的制度与最严密的法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廓清市场环境。

二是持续形成和优化多元共治与社会协同新机制。生态文明的治理主体不再仅仅是政府,而是需要构建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新质生产力,特别是数字技术,为实现多元共治提供了强大支撑。基于区块链的碳足迹追溯、依托大数据的环保信用评价、通过移动互联网的公众环境监督平台,极大地提升了环境治理的透明度、精准度和公众参与度。这有助于形成一种“自上而下”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社会创新相结合的治理格局,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转化为亿万民众的自觉行动。

三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提升绿色民生福祉。“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坚持人民至上理念,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增添民生底色。新质生产力是正义生产力,本质是解放人、发展人、成就人的生产力,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则^[28]。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生态与民生的本质联系,即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民生。要以新质生产力改善生态民生,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加快推动生态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城乡居民绿色消费、绿色出行和绿色居住水平。建立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建设机制,鼓励公众通过“互联网+环保”平台参与环境治理,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完善生态教育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增强全民生态伦理意识。推动生态补偿机制与绿色金融结合,提高生态保护区的居民收入,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的幸福源泉。

6.3 全面推动劳动者、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的绿色化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构成。在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三要素必须全面绿色化,才能形成符合生态价值取向的生产力体系。只有当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都完成绿色化跃升时,生产力才能真正具备生态底色和可持续性,从而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

一是以绿色素养锻造生态型劳动者推动实现劳动者绿色化。生态文明的根本动力在于人,劳动者的绿色化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首要前提。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绿色生产力要求劳动者具备较高的生态素养和技术能力,将生态理念内化为行为习惯。劳动者的绿色化,不仅是一种技能转型,更是一种文明自觉。习近平强调,“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29],这既是生态文明的伦理要求,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基础。绿色化的劳动者,意味着具备生态伦理意识、掌握绿色科技能力、崇尚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生态理性主导生产决策,以绿色创新引领技术变革。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应共同构建生态文明教育体系,把“生态文明素养”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覆盖生产、消费与治理的绿色人力资本体系。只有当劳动者真正成为生态文明的信仰者、



践行者和创造者时,新质生产力的活力源泉才能不断涌流。为此,需要从意识和实践两方面入手,加快培养劳动者的生态意识和创新意识,提升其绿色技术应用能力,实现劳动者向“生态人”转型。

二是以科技创新重塑绿色生产方式实现劳动工具绿色化。生产工具的变革是文明形态跃迁的关键标志。从蒸汽机到电气化,从信息化到智能化,每一次生产工具的革命都推动了生产力的质变。生态文明时代的生产工具必须实现“绿色革命”。绿色化的劳动工具,不再是单纯提高产量的机器,而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科技体系。发展绿色生产力,就要加速低碳高效生产工具的普及与迭代升级。例如大力发展光伏、风电等新能源技术和新能源汽车等绿色装备。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装备、数字孪生技术等正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智能制造与清洁生产的深度融合,使能耗和排放显著降低;新能源技术的突破,重塑了能源结构与产业链体系;数据要素的广泛应用,使生产工具从物理实体走向智能生态。劳动工具的绿色化,使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互促进,构建出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体系。生产工具的绿色化使生产过程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形成绿色制造业、绿色能源和绿色服务业等生态产业集群,有利于构建高效低耗、污染少的绿色产业体系。

三是以生态资源重构生产基础推动劳动对象绿色化。劳动对象是人类生产活动作用的直接对象。传统工业文明以资源掠夺为特征,而生态文明要求对自然对象的尊重、修复与再生。劳动对象的绿色化,是对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性变革。生态文明的劳动对象,不仅包括自然资源,还包括生态产品、数据资源、自然资本等多维对象。通过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绿色能源、碳汇工程等路径,实现资源的再生利用和生态价值的资本化。数字技术的引入,使生态监测、数据治理、碳交易等成为新的生产领域。劳动对象的绿色化,不再以占有自然为目标,而以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宗旨。此外,生态产品开发要成为劳动对象绿色化的关键,即依托生态系统并通过生产过程提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物质与服务。同时,要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通过生态监测技术、碳汇工程、生物修复等手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承载力。在数字经济条件下,还要实现数据等要素的绿色治理,将数据资源纳入生态文明治理范畴,加快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兴产业,推动劳动对象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7 结 语

新质生产力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是一个从物质基础(生产力)到社会结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再到文明内

核(价值伦理)的全面、系统、深刻的互动与塑造过程。新质生产力以其颠覆性的技术集群、重构性的要素组合和内生性的绿色导向,不仅为生态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引擎,更通过引发治理变革与价值重塑,全方位地支撑和引领着人类文明形态向生态文明的伟大转型。对这一过程的深刻理解与自觉推动,正是我们在历史交汇点上把握未来、开创未来的关键所在。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机融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当代创新,更以高质量发展、美丽中国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开辟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新维度。从理论到实践,从中国到世界,新质生产力以“守正创新”的哲学品格,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能够走通,更能走出一条超越资本逻辑、回归人性本质的文明新路。它既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还是人类文明形态转型的关键变量。随着美丽中国的全面实现与新质生产力内在逻辑愈发显示出较高的耦合性,“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必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绿色发展成效显著,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同时必须清醒看到,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中国资源压力较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的国情没有改变,环保历史欠账尚未还清,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21][277]}。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观来看,问题的存在与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相伴而生的。因此对于以上生态问题,我们要坚定信心一定能解决。同时,也必须看到,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动态演进的相对概念,其“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随着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要素的发展,原有的新质生产力亦将逐渐转化为传统生产力,而更新的生产力以及由此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涌现。为此,面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以更大力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把握“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科学论断的内涵体系和实践伟力,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持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画卷,推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范式转型(但不是代替工业文明)。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 2024(11):4-8.



- [2]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R]. 北京:新华社,2025-10-23.
- [3] 丁任重,高雨萌. 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J]. 学习与探索, 2024(12):128-135.
- [4] 岳奎,曲秀玲. 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发展维度[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8):15-21.
- [5] 黄三生,周明石.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向度[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5):93-99.
- [6] 周宏春. “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产业载体[J]. 生态经济, 2024, 40(7):13-19.
- [7] 侯美樾,孟献丽.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哲学意蕴[J]. 马克思主义哲学, 2025(1):46-53.
- [8] 李桂花,吴诗洁.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向[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4,38(12):27-38.
- [9]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153, 515, 516, 517.
- [10]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46.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207-208, 210.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188.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7, 185, 295, 516, 602.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440.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8.
- [17] 黄承梁. 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构建[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3):118-129,164.
- [18]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79.
-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5.
-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988.
- [21] 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5:3, 8, 21, 86, 277.
- [22] 反杜林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12.
- [2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34.
- [2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5.
- [25] 钱智勇,仲晓欢. 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与生态贡献[J]. 理论探讨, 2025(3):112-120.
-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 [27]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78.
- [28] 郭万超. 论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文化动因:构建新质生产力文化理论的基本框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4):25-34.
- [29]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N]. 人民日报,2025-10-29(01).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productivity paradig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UANG Chengliang¹, WANG Hui², ZHU Hongyan³, MA Qingshan¹

(1.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co-civiliz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China;

2. School of Law,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As an advanced form of productive forces led by innovation and breaking through traditional growth path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tand as the core driver guiding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hold profou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reshaping the global competitive landscape.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nomy, this study elaborates in depth on the theoretical logic,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the crucial proposition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mselves are green productive forc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ake revolutionary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novative factor allocation, and in-depth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s their formation mechanism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s their core hallmark. They have not only achieved a contemporary innovation of the Marxist theory on productive forces but have also become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propelling the transi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conceptual formulation to systematic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presents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following primitive civilizatio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ve increasingly demonstrated their strategic role in advancing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ductive force paradig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ave functioned as a core engine. In the process of thoroughly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centering on the realization of various strategic goal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through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planet Earth. It is crucial to recognize clearly that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scientific proposition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mselves are green productive forces” are paving the wa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and creating new prospects for advanc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building a clean and beautiful worl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ve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characteristic form of productive forces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ciety.”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nomy; green productivity

(责任编辑:刘呈庆,于 霞)